

# 1644: 帝国的疼痛

聂作平 著

DiGuo  
DE  
TENG TO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DiGuo  
DE  
TENG TONG

# 1644: 帝国的疼痛

聂作平 著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644:帝国的疼痛/聂作平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8.5

ISBN 978-7-101-06106-2

I.1… II.聂… III.中国-古代史-研究-  
1644 IV.K249.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519 号

---

书 名 1644:帝国的疼痛

著 者 聂作平

责任编辑 徐卫东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¼ 插页 2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7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6106-2

定 价 29.00 元

---

## 引 子

这是一个烽烟四起的年头：

从北国的边关到南方的都市，从万马千军捉对厮杀的中原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巴蜀，争战不休；战争是这一年永恒不变的主题。

这是一个血腥弥漫的年头：

往来不绝的征战杀伐，不论政府军还是农民军，战争的最终结果往往会不可避免地演变为对平民的屠杀。

这是一个群雄并起的年头：

这一年的中国大地上甚至有五个皇帝，从以正统自居的朱明末帝崇祯到乳牙未落的大清顺治，再到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还有醉生梦死的南明弘光皇帝。他们之间的角逐不仅是几支军事力量的抗衡，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生死相搏的大较量。

这是一个民不聊生、官也不聊生的年头：

对百姓来说，要么饿死，要么被杀，要么起而杀人；对官员来说，要么死于异族，要么死于农民军，要么被朝廷处死。

这是一个才华横溢却又国破家亡的年头：

王朝倾覆，偏安江南，秦淮河上依然绿肥红瘦，歌吹沸天，才子佳人的悲欢离合与江山的鼎革悲哀地进行着合奏。

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悲剧之年：

这悲剧，不仅在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族王朝走向了灭亡，更在于纯正的古典精神到此划上了一个永远的句号。

这一年的中国，也许有许多种可能，但最后的结果却是，正当西方世界通过文

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步步走向近代化时,古老中国却由明王朝的专制陷入了清王朝的专制,并且越陷越深……

这一年,岁在甲申,即公元 164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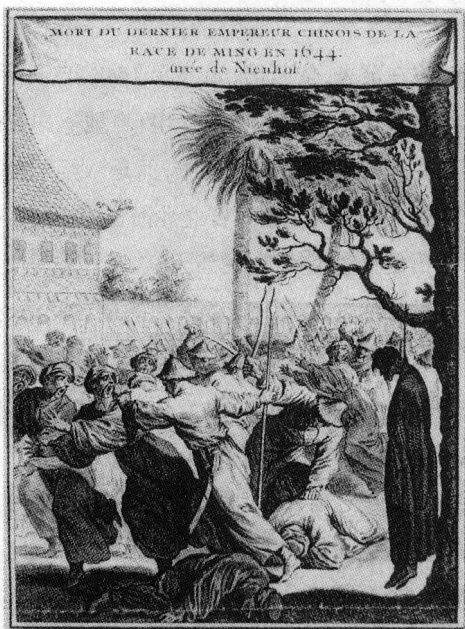
# 目 录

引子	1
<b>第一章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b>	
一 凶兆与流年	2
二 阴影里的祖宗	8
三 性格决定命运	21
四 致命的临终手术	28
五 皇帝的凄凉末路	43
<b>第二章 李自成：驿卒的反抗</b>	
一 十八子，主神器	48
二 闯王是怎样炼成的	55
三 掉进米缸的老鼠	73
四 一个符号的归宿	84
<b>第三章 努尔哈赤和他的子孙们</b>	
一 努尔哈赤的原始积累	92
二 武力决定命运	100
三 一个士大夫的艰难抉择	108
四 亲者痛仇者快的凌迟	112
五 多尔衮的决断	127

<b>第四章 史可法：中国式表演人格</b>	
一 信息不对称的两封信	142
二 不成气候的小朝廷	145
三 如何才能死得更悲壮	160
<b>第五章 文人生涯：以陈子龙和侯方域为例</b>	
一 愤怒青年陈子龙	176
二 风流才子的追悔	194
<b>第六章 在底层：甲申年民间实录</b>	
一 杀人者的事业	210
二 江阴，一座城市的玉碎	229
<b>第七章 结语：中国仍在沉睡</b>	
<b>主要参考书目</b>	246
<b>三百六十多年前的隐痛与伤恸(代后记)</b>	251

## 第一章

#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十七世纪法国人绘《崇祯皇帝自缢图》

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

——孟森：《明史讲义》



## 一 凶兆与流年

大明崇祯十六年，岁在癸未，依西历，为公元 1643 年，即甲申之变的前一年。这一年初夏，远离京师的四川南部出了一桩怪事：当地一户农民院子里的一株李子树，结出的果实不是往年那种圆而翠的李子，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黄瓜。这件事在当地闹得沸沸扬扬，人们把它当作不祥之兆而议论纷纷。有好事者就请了巫师占卜，巫师得出的谶语是：“李生黄瓜，民皆无家。”

放在承平时代，这种公然宣布天下就要大乱的胡言乱语，必定会遭到官方的严惩。但这一回，官方对此充耳不闻，甚至有不少下级官吏也加入到流言散布者的行列。总之，这件事在当地引起极大反响——可以想象，大动乱来临的前夜，这种稀奇古怪的事件必然激起民间的骚动不安。

科学家早就发现，大地震之前，比人更低等的其他动物，往往都能凭借它们敏锐的直觉预感到大祸临头，从而烦躁不安或是疯狂奔跑，而比它们更高级的人类却毫无知觉。与此相类，王朝更替，社会大动荡即将到来之时，底层民众往往多了些敏感，而达官贵人却浑然不觉。他们不愿意相信也不敢相信，天下真的就要大乱，改朝换代真的就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李子树长出黄瓜也许是基因的变异，但身处末世的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这是上天对乱世即将到来的预警。为此，当地民众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有钱人开始囤积粮食，纷纷在家里深挖地窖，把大量小麦和稻谷埋藏在地下，以备将来救命之用。悲惨的是一些无钱无粮的穷人，他们看不到希望何在，却感受到了绝望的脚步日益临近。为此，有一户赤贫人家竟然变卖了财产，把得来的几两银子割

肉买酒,大吃大喝。钱花光之后,这家人关门闭户,举家自杀。对这种完全不正常的社会现象,当地地方官却不闻不问。或者说,太多的怪异之事已经麻木了他们的神经,见怪不怪。

几个月后,大明帝国的许多子民都惊恐地看到,那一年的太阳发出血红的光,“日中有赤气数道,下宽上锐,自东指西”。晚上,一颗大星出现于西天,芒焰闪烁不定。北斗是中国古人借以辨别方向的标志性星座,但当人们仰视天空时,竟然再也找寻不到北斗的踪影。

按照古老东方天人合一的观点,一个朝代即将崩溃的前夜,上天一定会通过各种奇特的灾异或是怪诞之事警告世人,尤其是警告那些高高在上的君王:你的江山已经不再固若金汤,上天将要抛弃你。

民间如此风声鹤唳,而即便是居于国家机器这座金字塔上层的朝廷高级官员们,也为甲申年初春发生的另一桩怪事深感不安:按照惯例,每年二月初八,朝廷要派出高级官员在学宫里举行祭祀孔子的仪式。甲申年的祭孔,由官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崇祯帝早年亲自面试录取并一步步提拔起来的魏藻德主持。典礼前本来天气晴朗,一派祥和景致,孰知就在一大群官员准备行礼时却突然间狂风大作,学宫庭院里高大的松树也被吹得东倒西歪,那原本熊熊燃烧于孔子神位前的几十盏灯烛,竟然全被狂风扑灭,甚至连学宫外的仪仗队伍也被狂风吹散。等了半天,狂风仍然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魏藻德和其他高级官员商议了一通,只得宣布祭孔典礼暂停。官员们私下里说:这是孔夫子的在天之灵不愿意接受明朝的祭祀了,圣人的眷顾已经转移,大明朝还有什么希望呢?

1643年到1644年的冬春之交,作为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崇祯帝,比任何时候都更真切地感受到大厦将倾的悲剧将成为不可挽回的事实。笔记小说里记载了一个崇祯算命的故事——

故事说,内忧外患的崇祯心急如焚,有一天独自走出皇宫,微服上街。宫门外不远处,他遇到一个据说特别灵验的测字先生。崇祯一向很迷信,他也想测个字,看看国运如何。测字先生让崇祯随手写个字,崇祯就写了个友字。测字先生见了,皱着眉头说:友字乃是反字出头,现在李自成已攻下洛阳,这不意味着反贼已经出头了吗?大为不利啊。崇祯十分不快,强自镇静说,我要写的是有没有的有,不是这个朋友的友。测字先生连连摇头:这回更不妙,有字拆开来看,就是大明两

个字各自去掉了一半。崇祯忙改口说，还是没对，我想写的是申酉戌亥的酉。测字先生这回神色紧张地说：不得了啊，酉字就是把尊字去首去尾而成，这不是说至尊连头都保不住了吗？

崇祯本想讨个口彩，没想到却被测字先生迎头三记闷棍，内心的气急败坏可想而知。等他回到宫中，派人前去捉拿测字先生，可哪里还找得到测字先生的人影呢？据说，这个测字先生乃是李自成手下最得力的谋士矮子宋献策，他有意装成测字先生，企图从精神上打垮强弩之末的老对手崇祯。

这显然只是文人的创作，不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但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相信自己，失意的时候则大抵相信天命。这个故事所塑造的崇祯，身上集合了敏感、侥幸和外强中干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与历史上的崇祯本人的性格脉络倒是基本一致。作为大明十六个皇帝中的最后一任，他将亲身体验国破家亡的旷世悲剧。

甲申年春节是崇祯一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新年，也是他一生中所过的新年里最黯然无光的一个。除夕之夜，北中国上空飘着细细的雪花，风呼呼地吹，偌大的北京城像一只沉默的巨兽，笼罩在一派肃穆和压抑之中。虽然风雨频仍，皇宫里仍然小规模地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安排晚宴，努力营造祥和的节日气氛，如同江河日下的大户人家绷着面子搞排场。到了子时，按照规矩和传统，皇帝要在太极殿接受臣子们的新年朝贺。当崇祯强装笑脸来到太极殿时，空荡荡的大殿里竟然一个大臣也没有。

正当崇祯又惊又恼时，只见刚入阁不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独自匆匆赶来——其他的众多臣子，他们在新年的第一次早朝时集体迟到了。崇祯很生气，一生气便宣布取消新年早朝，自顾自回后宫了。等到集体迟到的臣子们来到太极殿，才发现他们威严的陛下早已不知去向。大臣们面面相觑，没人敢吭一声。雕梁画栋的太极殿，死一般的沉寂。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离北京一千多公里以西的西安却是另一派欢乐景象：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在这里宣布建立大顺王朝（李称顺王），改元永昌，定都西安，并改西安为长安，称西京。和李自成一同征战多年的手下兄弟，一个个都得到了应有的封赏：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西京城里，鼓乐震天，酒香飘溢，恰好与

北京城的死寂和压抑形成鲜明对比。

李自成称王之日，西安天气不好，风沙弥漫，黄雾四塞，李自成见状有些不悦，学士姜学一进言道：如此大雾，正预示着大王将要掩盖明朝呢。李自成听罢，大感宽慰。当天夜里，西安张灯结彩，农民军——现在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大顺军——全体将士都沉浸在如梦如癫的狂欢之中。这些当初为了混口饭吃而揭竿起义的泥腿子，终于迎来了和原本高高在上的大明皇帝分庭抗礼的机会。

几天后的正月初九，放在往年，还是举国狂欢闹新春的佳节，但这一年的北京城注定不会再有任何欢乐了，哪怕这欢乐只是强扮欢颜的伪装，也统统不会再有了。这天，兵部官员们收到了李自成派人送来的通牒，上写大顺永昌年号，约定双方决战，并宣称他的百万大军将于三月十日抵达京师。这个多年来一直被朝廷视作反贼和流寇的陕西汉子，已经不再承认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大明王朝上上下下都已然明白，下岗驿卒李自成不再是当年的流寇，而是一支志在推翻大明王朝并取而代之的可怕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兵部官员们读罢通牒，相顾失色，久久说不出话来。他们匆匆商议了一番，只得把反贼的通牒火速呈报给崇祯。崇祯同样大惊失色，下令召开御前会议。

然而这样的会议注定不能讨论出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会上，大臣们顾左右而言他，却没人能够或者愿意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崇祯当着大臣们一再哀叹：“朕非亡国之君，事事皆亡国之象。祖宗栉风沐雨之天下，一朝失之，何面目见于地下？”当大臣们无人敢吭一声时，他又似乎很慷慨激昂地表示：“朕愿督师，亲决一战，身死沙场无所恨，但死不瞑目耳！”可还没等到大臣们对他的慷慨激昂有所回应，他又愤然指责文武百官没人能为他分忧——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大臣身上，崇祯算是独特一例。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详讲。

圣上的话说到这种地步，大臣们要是还不站出来有所表示，游戏恐怕就玩不下去了。果然，内阁首辅——名义上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事实上相当于宰相——陈演表态说他愿意代替圣上出征，崇祯想也没想就说“南人不可”。接着，内阁次辅魏藻德、蒋德璟、范景文等人按各自的职务、资历为序先后请求代帝出征，崇祯仍然不同意。最后，新入阁才两个多月、资历最浅的内阁大学士李建泰站出来：“主忧如此，臣敢不竭弩力。臣晋人，颇知贼中事，愿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臣请提兵西行。”这时，崇祯才转怒为喜：一者，他本来就属意李建泰；二者，也

是至关重要的，李建泰明确表示不需要国家拨给军费，而是由自己出钱为国家打仗。

崇祯欣喜地表示，如果李建泰愿代他出征，他将仿效古代帝王遣将的最高礼仪，亲自为他举行郊饯之礼——就是由皇帝亲自送到城外并喝一席酒。但李建泰不敢领受这样高规格的礼仪，坚决辞谢。崇祯只得令礼部另议。

甲申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李建泰代帝出征终于成行。崇祯特地行遣将礼，这是大明王朝历史上不多的最隆重的出征仪式之一，仿佛是大明王朝临终前的回光返照。当是时，驸马万炜代表崇祯到太庙祭告祖宗，崇祯则来到大殿，当场手书“代朕亲征”条幅送给李建泰，并授予他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此后赐宴正阳门楼，崇祯又亲自为李建泰倒了三杯酒，连同盛酒的金杯一起赐给他。行前，崇祯勉励李说：“愿卿蚤荡妖氛，旋师奏凯，侯封进爵，鼎彝铭功。……朕仍亲迎庆赏，共享太平。”然而，恐怕包括崇祯本人在内，已没有任何人相信这一番完全不可能实现的梦话。在崇祯的目送下，李建泰带着这支拼凑起来的乌合之众出城而去。

说这是一支乌合之众，乃是因为这支部队全由基本没有战斗力的京营兵组成。京营兵大多是富家子弟或中低级官员的子侄充任，平时作威作福，一听说要打仗就吓得要死，纷纷出钱雇佣贫民或是市井无赖为自己充差。这之前，李建泰只拨得京营兵五百人，看看实在不成样子，崇祯才又拨了一千名，加在一起，也不过区区一千五百人，而兵强马壮的李自成麾下已有数十万之众，而且很多是多年征战的老兵。更为重要的是，李建泰之所以愿意代帝出征，并不是真的为国分忧，而是想借此机会保护他在山西曲沃的老家。《明史·李建泰传》明确指出：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

李建泰带部队出北京城后，慢腾腾地按照古代军队日行三十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与此同时，李自成的军队早已渡过黄河，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山西。当李建泰行至离北京城不过百里之遥的河北境内时，他的军队已经有不少人开小差扔下武器逃跑了。

荒唐的是，沿途所经过的州县害怕李建泰进城征兵索饷，竟然关上城门，不准这位持有尚方宝剑的内阁大学士进城。李建泰大为光火，下令派兵攻打，这才得以进入一座叫广宗的县城。攻打帝国治理下的广宗，这几乎是李建泰此次代帝亲

征中惟一一次像样的军事行动。当李建泰的老家曲沃失陷的消息传来，他又气又怕，病倒在军营。此后，他就一直在河北境内徘徊。等到李自成部下刘芳亮围攻他所在的保定时，他完全放弃了抵抗，干净彻底地向反贼投降。一个多月前崇祯赐给他的金杯、敕书、尚方宝剑和关防大印都成了农民军的战利品。此时，几百里外的北京城里，崇祯还在苦苦等待他凯旋的消息。

据记载，早在李建泰出北京城之后的第三天，崇祯误听传闻，忽然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问他：真定陷落了，李建泰也遇害了，你知道吗？张缙彦回答说不知道。崇祯生气地说，我在深宫都知道了，你作为兵部尚书怎么还不知道？张缙彦说，我还没见到塘报。崇祯说，那为什么不派人远侦？张缙彦回答说：骑侦须工食，臣部钱无一缗，无从侦骑。——兵部作为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竟然穷到了连派几个骑兵出去侦察也没钱的地步，这在历史上简直是空前绝后的奇闻，说明甲申年的明王朝已经到了怎样山穷水尽的末路。

眼看帝国走投无路，无计可施的崇祯悻悻地发了一道罪己诏。

罪己诏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国粹。在古代，大凡遇到天下有灾异或是大动荡，做皇帝的就得下一道诏书，诏书的主题就是皇帝自我批评。苏东坡认为，罪己诏有利于挽回人心，网罗民意。著名的如汉武帝，晚年就向全国吏民下达过《轮台罪己诏》。

对崇祯来说，下罪己诏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花样了，在他执掌帝国的十七年里，一共下过五道罪己诏：

第一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八年十月，原因是农民军攻克凤阳并把朱家的皇陵挖得一片狼藉。被人刨了祖坟，就是平头百姓也要红眼拼命，何况皇家呢？

第二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原因是清军入塞深入山东，俘走人丁近四十万；

第三次下罪己诏是崇祯十六年六月，原因是张献忠攻破武昌，宗室楚王被杀，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

第四次、五次下罪己诏便是崇祯十七年——也就是甲申年——二月和三月，当是时，帝国已经如同汪洋中的一条破船，随时都有被风雨吞没的危险。

然而，几乎和以往所有的罪己诏一样，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充斥的仍然是文

过饰非的空洞说教和对满朝文武的严厉批评。估计有幸读到这道罪己诏的吏民已经不多了一——其时，帝国命令的传达范围早就局限在极其有限的地区内。

空洞虚伪的罪己诏对生民涂炭、兵火连天的天下于事无补。更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崇祯的第四道罪己诏下达四天后，李自成也发布了一道诏书，像是要和北京城里的崇祯唱对台戏。在这道传布天下的诏书中，李自成历数了大明帝国的种种罪恶，如“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阎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绔，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龀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心；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同样在这道诏书中，李自成要求明朝君臣审时度势，及早向他投降，这样还可以“如杞如宋，享祀永延”。就是说，如果崇祯愿意把天下拱手交出来，不但可以保全自家性命，还能得到小国封君的待遇。

至此，哪怕是最麻木的明朝官员也已明白，享国长达二百七十多年的大明王朝真正走到油枯灯灭的最后时刻了，他们那位多年来一直阴沉着脸的皇帝陛下，在龙椅上的日子快要到头了。

和大臣们相比，崇祯心里更加明白火烧眉毛的严峻局势，但他一直还在等待，等待着并不可能的奇迹的发生。他的臣子们把这封类似最后通牒的李自成诏书给他呈上去时，他出奇地没有大发雷霆或是痛哭流涕。他很冷静，反常地冷静。

但他不可能选择李自成给他指出的道路：投降。

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将和祖宗打下的江山一起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从做皇帝的那一天起，他就被命运锁定成大明王朝的殉葬品。

## 二 阴影里的祖宗

如果从空中掠过北京，你会发现这座古老的大都市中心，有一组气象庄严的古老建筑，严密有序地占据了城市的中轴线，这就是被称为故宫的紫禁城。兴建于明朝初年的紫禁城，至清朝灭亡的五百余年间，先后有二十四位皇帝在这里登基执政。漫长的五个多世纪里，这里是帝国的核心，帝国的最高决策从这里发布出去，遥遥地指挥着广袤国土上的亿万兆民。

紫禁城众多的建筑中，有一座最为高大出众，那就是太和殿，民间习惯性地把它称作金銮殿。金銮殿上最显赫、最夺人心目的无疑是那把沉重无比、被称为龙椅的椅子。那张以现代人的标准看来，坐上去并不会觉得舒服的椅子，普天之下只有皇帝一个人才有资格把他尊贵的屁股放上去。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打进金銮殿坐北朝南，高踞于那把庞大的龙椅之上，是不少胸怀大志或腹藏野心者激荡在心的绚丽梦想。

当后来被史家们称为崇祯或称明思宗的那个末代皇帝还是一个名叫朱由检的年轻人时，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坐到金銮殿的龙椅上，成为整个大明王朝惟我独尊的最高统治者。

多年以前，当朱由检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少年时，他曾经站在距龙椅几步开外的地方，好奇地看着坐在龙椅上的那个峨冠博带的年轻人，那个年轻人是他的哥哥。朱由检抬起头天真地问：皇上，你这个官儿我可做得否？他的哥哥微笑着随口回答说：我做几年时，当与汝做。

对一个开国两百余年的大帝国的末代皇帝来说，在崇祯面前，是一长串已经成为历史的传统，是无数个站在阴影里的祖宗。他们虽然已经先后辞世，但他们的影响却依然无处不在。更何况，对崇祯来说，他的这个帝位来得有点偶然，偶然得他并没有多少心理准备。

史学家孟森先生说过：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更有史家进一步指出，明朝表面上亡于崇祯，实质上却亡于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他的祖父神宗万历。因此我们检讨甲申之变，许多事情却要从万历时代甚至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说起。

大明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一桩株连甚广的案件发生了，那就是史家们所称的胡惟庸案。胡惟庸早年与朱元璋一同打天下，是朱的亲信之一，洪武三年，官至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任右丞相；此后，升至左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随着权势的不断扩张，胡惟庸日益骄横跋扈，擅自决定官员人等的生杀升降。各地上报朝廷的文件，凡是对他不利的，一律扣压、销毁。大批趋炎附势的官员为求自保，纷纷向他重金行贿。这种过火的做法，引起了朱元璋的极大关注和不满。于是，就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对胡惟庸集团下手了：胡惟



庸被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处死，受其株连者达数万人之多。

胡惟庸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胡惟庸集团遭受灭顶之灾，更在于从那年起，朱元璋即宣布废除丞相制，并告诫他的子孙，“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

丞相起始于战国，为百官之长。秦朝时成为封建官僚组织中的最高官职，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以后历朝历代皆沿袭之。关于丞相的职责，汉初名相陈平曾下过结论：“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讲：“依照文字学原义，丞是副贰之意。所谓相，也是副。……所以丞是副，相也是副。正名定义，丞相就是一个副官。是什么人的副官呢？他该就是皇帝的副官。皇帝实际上不能管理一切事，所以由宰相来代理。”作为皇帝最重要的助手，到朱元璋时代，丞相这一职位已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

丞相制的废除，是明代政治的一个重大特点。通俗地说，这种政治体制成了一种名符其实的专制政治，即皇帝亲自统帅六部，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一切均由皇帝独裁，中央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这种体制，当然可以有效地防止曾引起朱元璋高度重视的元末“宰相专权”、“臣操威福”的局面重演，但同时也使皇帝成为整个帝国任务最重的人——通俗地说，废除了丞相之后的皇帝，相当于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总理，既是一家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总经理。《明史·职官志》对此的记述是：“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

皇帝“自操威柄”的体制下，可想而知的一个既定事实是，如果皇帝想要称职——哪怕仅仅是基本称职——他也将成为帝国上下最忙碌最必须陷入无始无终工作的人，“皇帝实际上是将过去的君权与相权集于一身。这样，皇权的确是大大加强了，但需要由皇帝直接处理的政务也大大增加了”。明制，皇帝一天要上早、午、晚三次朝，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里，皇帝得三次和文武百官见面，既要听取各方面的汇报，还要对这些五花八门的汇报作出相应的指示。据统计，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的八天时间里，朱元璋除了每天三次上朝外，其余时间还批示了各个部门送到宫内的奏章一千一百六十件。这些来自各部门、各地区的奏章，有的专讲一件事，有的则一个奏章讲几件事，综合起来，一共讲了三千二百